

企鵝人生

PENGUIN
LIVES

溫斯頓·丘吉爾

〔英〕約翰·基根 著

李陽 譯



Winston Churchill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正 始 人 生

PENGUIN
L I V E S



温斯顿·丘吉尔

〔英〕约翰·基根 著

李阳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title of **Winston Churchill** by **John Keega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pper Publications, L.L.C and Viking,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A Lipper / Penguin Book



“企鹅”及其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
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
之非法版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斯顿·丘吉尔 / (英) 基根著; 李阳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5.3

(企鹅人生)

ISBN 978-7-108-05212-4

I. ①温… II. ①基… ②李…

III. ①丘吉尔, W.L.S. (1874~1965) —传记

IV. ① K835.6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11373 号

总 译 审 胡允桓

策划编辑 刘 靖

责任编辑 颜 箐

特约编辑 赵 轩

装帧设计 蔡立国 索 迪

版式设计 薛 宇

封面版画 袁亚威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5-017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字 数 120 千字 印张 7.75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目 录

丘吉尔和历史	1
家庭和青少年时代	23
军旅生活（1894—1900）	45
议员（1900—1910）	73
身居要位（1910—1915）	95
战争与和平（1915—1932）	117
步步惊心（1933—1940）	139
砥柱中流的首相（1940—1941）	161
三巨头（1941—1945）	187
神 化	211
参考书目	237

丘吉尔和历史

在战争年代尚年幼的人们眼中，丘吉尔恐怕是个被高估的人物。年轻人都崇拜英雄，然而对不列颠岛遭围困时期的学生们来说，首相可无论如何都不像个英雄。刚刚从硝烟中归来或即将奔赴战场的英雄们，都是身着卡其布、海军蓝或空军蓝军服，身材瘦削，体态匀称，谈笑风生，昂首阔步地走在大街上的。相形之下，丘吉尔穿着难看的连身工作服，戴着滑稽的大礼帽，招牌式的雪茄夹在松垮垮的手指间，一点儿英雄气概也没有。成年人赞扬“温斯顿，好心的老温斯顿”，这令孩子们很恼怒。战时英国的学生们可不想要老温斯顿，他们想要的是年轻气盛的首相，像从机场上一飞冲天的飞行员一样威风凛凛，像在街巷奔跑训练的突击队员一样气势汹汹，像驶离港口前往英吉利海峡作战的鱼雷艇艇长们一样英气勃勃。在这些英雄形象的映衬下，体态臃肿、下巴松垂、声音沙哑的温斯顿，实在是寒酸之极。

战后年代的温斯顿更为不堪。他在面对民众的意愿时显得很傲慢，这使他在 1945 年下了台，预示着他将成为人生的大输家。无论父母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也无论自己有何政见，青少年们都情不自禁地为获胜的工党所承诺的社会革命的激情所感动。丘吉尔作为反对党政治

家，对工党宣扬的社会主义横眉冷对。年轻人则对社会主义的主张信以为真。全民免费医疗不言而喻是件好事，为高中和大学聪明而勤奋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无论他们的父母能否供得起他们读书，这当然也不错；还有，国家为老年人和穷人提供更优厚的养老金和救济金；为住在贫民窟的人盖新房子；使战前经济衰退时期的幸存者得到有保障的就业。工党说这代表着更好的英国，年轻人们相信了。丘吉尔警告说社会主义的英国会更糟，却招致怀疑，至少在未来一代中如此。

我就是这一代人中的一员，在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我始终对丘吉尔的传奇无动于衷。丘吉尔于1951年再度上台，尽管健康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一次差点儿残废——他一直担任首相到1955年。他出色地表演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大戏。他在政治上的儿子和继承人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接替他出任了首相。艾登任命了大量年轻人担任大臣，这些人都是在丘吉尔任战时首相期间担任低级职务，从而学会政治交易的。尽管实现了内阁年轻化，艾登接掌丘吉尔的战后政府，却并没有赢得年轻选民的欢迎。在年轻人看来，艾登和他的同僚们都是观念陈旧的保守党人：对外是传统的帝国

主义，对内是自私的资本主义。1956年，英国企图采取“苏伊士行动”，恢复对苏伊士运河和埃及国家的半殖民地控制。这似乎成了“丘吉尔主义”最后一搏的试金石。苏伊士运河危机将英国人分为两个阵营。在年长者看来，军事行动可被视为对历史赋予英国的帝国权力的适当重申；而在年轻人看来，这是已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帝国主义淫威的鲁莽发作。无论如何，“苏伊士行动”的失败，标志着英国海外史诗的结束。而丘吉尔在其漫长的一生中，始终都是这部史诗的旗手。苏伊士事件向丘吉尔所代表的一切说了再见。

这些无疑是我学生时代结束时的观点。1957年那个酷热的夏天，在纽约城，一个偶然事件改变了我对这位在我成长时期领导我们国家的政治家的看法。当时，在我就读的牛津大学一位毕业生的慈善资助下，我开始了一次美国之旅。我等待着和他所设立的旅行奖学金的另一位受惠人会合。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到外国旅行，以往到法国旅行都是和同学或亲友同行的。我所租住的公寓俯视着联合广场（Union Square），那里当时是一个单调乏味的商业区中心。房东外出了，我在该城一个人也不认

识。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无所事事，感到孤独寂寞，还有一种刚刚进入成人状态的忧郁和迷茫。当时的美国雄心勃勃，比发展迟缓且饱受战争重创的英国显得精明得多、时髦得多。在精神状态上，美国人也显得远比英国人积极自信。我刚刚离开几个星期的英国，无可辩驳地正江河日下，而我所进入的美国，无论在财富还是在享有世界霸权上，都明显在蒸蒸日上。我那没有现身的东道主属于美国的精英阶层：出身于常春藤联盟名校，入选社会名流录，享受着纽约知识界的时尚生活。他们所属的阶级，正要接管整个地球，而我的祖国，在统治全球一个世纪后，正日薄西山。

在他们成堆的密纹唱片中，这对英国访客来说又是新鲜玩意儿，我发现了能使自己沉溺于自我诱导的忧郁情绪的音乐，如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Eroica*）和布鲁克纳（Bruckner）的《第七交响曲》。强音和弦加重了不熟悉的亚热带酷热带来的嗜睡感。继而我又发现了一件别样的东西：一张叫做《温斯顿·丘吉尔战争演讲》（*The War Speeches of Winston Churchill*）的唱片。我不禁纳闷儿：聪明的纽约人怎么会要这样过时、无趣和浮夸的东西呢？前首相那冗长乏味、还不时间断的花言巧语对他们

有什么意味呢？1940年时我还年幼，还不知道丘吉尔先生都说了些什么，纯粹出于好奇心，我将唱片放在留声机转盘上，听了起来。

效果振聋发聩。指针选择的是1940年5月19日丘吉尔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面向全国讲的那段话。我立刻听出那的确是他的声音，但是他言辞的力量和鼓动性却是我前所未知的。“我首次作为首相向你们讲话，”他开始讲道。时至今日我仍然能背诵那段讲话，它深深地感染了我，我想当年也一定深深地感染了焦虑不安的听众们。当时法兰西战役正处于危急关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行将咽气，英国远征军也已全面败退到敦刻尔克（Dunkirk）。“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帝国、我们的盟国，尤其还有自由的事业处于生死攸关的这个重大时刻，我首次作为首相向你们讲话。”三个沉重有力的节拍——“国家”、“帝国”、“盟国”——之后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渐缓乐句，“自由的事业”。

我感到自己的脊梁骨硬了起来。随即那声音又改变了节拍，从渐缓的乐句变成了宣叙调：

法国和佛兰德斯正在进行着一场空前的大

战。德国人[丘吉尔在发“德国人”的词音时，能够将威胁与轻蔑结合起来]将空中轰炸与全副武装的坦克出色[丘吉尔在用“出色”这个词时，往往也表达着轻蔑——1954年，当议会将格雷厄姆·萨瑟兰（Graham Sutherland）所绘的丘吉尔肖像送给他时，他的评判便是“现代艺术的一个出色例证”]地结合起来，已经突破了马其诺防线北部的法军防御。他们强大的装甲部队正在蹂躏着在头一两天没有任何保卫者的开阔的法国国土。他们已经深深地楔入了法国境内，在他们所到之处，混乱和恐慌正在蔓延。

在他们身后，已出现了卡车运载的步兵，在他们身后，大批的部队正在跟进。

尽管作为首相的丘吉尔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机，作为战士的丘吉尔仍然禁不住要描述军事行动的雷霆万钧和跌宕起伏。他讲得绘声绘色，也令人不寒而栗。

继而他的情绪再次一变，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们过去有分歧、有争执；但是现在，一条纽带将我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浴血奋战直至胜利，无论经受

怎样的苦难和损失，决不投降受辱做奴隶。”最后他承诺道：“我们必将战胜，我们也应当战胜。”

在纽约6月那个酷热的夜晚，我倚在窗台上，听着唱片继续运转。接着播放的是1940年6月18日的演讲。那一天，逃亡的戴高乐将军向他的祖国人民发出了“为自由法国而战”的号召，并表示坚信最后的胜利。丘吉尔情绪高昂：

希特勒[这个名字丘吉尔是用喉音发出的，带着爆响，后来为人们所熟悉]明白，他必须在英伦三岛上打垮我们，否则他就将输掉整个战争。如果我们能抵挡他[背景中回响着维多利亚时代诗人亨利·约翰·纽博尔特(Henry John Newbolt)的《生命火炬》(*Vitai Lampada*)的音乐声，这是一首歌颂青年学生体育精神的史诗，曾激励过无数英国人]，整个欧洲就将获得自由，全世界人民也将迈向宽广辽阔、阳光灿烂的美好前程。然而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整个世界，包括美国在内，包括我们所熟知所珍爱的一切在内，都将陷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

的深渊。被用于罪恶目的的科技，会使这个黑暗时代更加险恶、更加漫长。所以，让我们鼓足勇气，担负起自己的使命吧。如果大英帝国及其联邦能够长命万年，人们会说：“这是他们最光荣美好的时刻！”

我浑身突然充满了一种并不习惯的对祖国的自豪感，也为与这样一个人物同一国籍而深感骄傲。当凡夫俗子们也许已在寻求与不可一世的敌人妥协时，这个人却能感受到这样的勇气，并且能在他领导的人们身上唤起同样的勇气。他代表了一种我自此再不怀疑的真正的领袖气质。他演讲的主题是恒常的。当希特勒重兵压境英吉利海峡时，那些主题作为对最黑暗的时日的挑战，在五年战争的每个阶段反复奏响，用唱片中不断重复的话语叙述着：艰难和痛苦，但也有阳光和希望，最终会迎来征服和胜利。在他第一次作为首相向议会下院讲话时，他说他只能奉献“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但几乎在同时，他也宣布了一项政策和一个激动人心的惊人目标：“若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在陆上战斗，在海上战斗，在空中战斗。尽我们的所能，尽上帝赋予我

们的全部力量去战斗……若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那就是：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夺取胜利，不惧一切恐怖去夺取胜利，不论前路多么漫长、多么艰苦，去夺取胜利。”这话是在1940年5月13日说的。6月4日，他向议会下院发表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演讲。英国远征军从敦刻尔克海岸撤离的行动刚刚进入尾声：再度跨过英吉利海峡的士兵们除了步枪，几乎什么也没有带回来。他们放弃了全部辎重——大炮和坦克——而这些重武器是英国迎击德军侵略所迫切需要的。国内没有替代品，没有储备，也没有构筑防御工事。民兵、地方军很晚才组建，只能用干草叉和长矛等武装起来。疯狂的空袭很快就将来临，德国舰队也随时可能跨越英吉利海峡。不列颠岛实际上毫无防备。任何客观的分析都认为英国死到临头了。所有合理的判断都建议，无论德国提出什么条件，英国都应该谋和。然而，丘吉尔断然拒绝了任何条件的投降。

“我们决不气馁，决不屈服，”他坚称，“我们要坚持到底……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不列颠岛，我们要在滩头作战，我们要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要在田野里、街巷中、山丘上作战。我们永远不投降。”据说那

些听过这番言辞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他语句的节奏、他声音的质地，以及他说“我们永远不投降”时那“永远”的大无畏气概。他的演讲深深地震撼了人心。那种感觉通过从下院议员到普通百姓的口口相传，开始了牛津大学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所谓的丘吉尔“将其意志和想象力强加于他的国人”的过程。灌输的“强度极大，以至于他们最终都接受了他的理想，开始以他看待他们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了”。

他怎样看待他们呢？贵族丘吉尔也是平民主义者丘吉尔，但无论他以哪种面目出现，你都不难看出骨子里那个浪漫的丘吉尔。他浪漫地看待他祖国的历史，因此也就很容易浪漫地看待其国民。第四骠骑兵团中尉丘吉尔，作为一名年轻军官，当然知道吉卜林（Kipling）笔下的汤米·阿特金斯（Tommy Atkins）——大英帝国长期服役的列兵。吉卜林的《三个士兵》（*Soldiers Three*）——利罗伊德（Learoyd）、奥瑟里斯（Ortheris）、马尔瓦尼（Mulvaney）（分别是阴郁执拗的约克郡人、愤世嫉俗的伦敦人、刚愎任性的爱尔兰人）——也是丘吉尔非常熟悉的。他一定像吉卜林一样看穿了他们的缺点：为人粗

鲁，沙文主义，种族歧视。但他也觉察到他们的优点：爱国，勇敢，忠诚——甚至达到了令人厌恶的高傲的程度，普遍具有公平竞赛的价值观。他对他自年轻时就曾竞选的奥尔德姆（Oldham）、曼彻斯特（Manchester）、邓迪（Dundee）等选区劳工阶层保守的托利派（Tories）的熟悉，更坚定了他的信心——英国人有献身大英帝国的精神。他当过兵，了解英国男子汉的勇敢刚毅。他是珍妮·杰罗姆·丘吉尔（Jennie Jerome Churchill）的儿子、伊丽莎白·埃弗里斯特夫人（Mrs. Elizabeth Everest）精心照管过的孩子、克莱门蒂娜·霍齐亚（Clementine Hozier）的丈夫，这三位都是坚强的女人。他的母亲是美国人，后来加入了英国籍。他从她们身上，了解到英国女人也具有深刻的英国国民性。在他看来，英国国民性主要就是勇气、坚韧和根深蒂固的道德礼仪。

因此他伟大的战时演讲反复出现的主题——号召人们做出牺牲，对困难发出警告——便是所来有自的了。他在1941年6月说道：“英国人是唯一喜欢别人告诉他们情况有多么糟糕的民族。”——然而他仍然一次又一次地反复承诺，胜利一定会到来，哪怕实际形势在不断恶化。1940年5月13日，就在德国向西方大举进攻三天之后，

英法联军面临灾难性的厄运之时，他坚定地宣布了目标：

“不惜一切代价去夺取胜利，不惧一切恐怖去夺取胜利，不论前路多么漫长、多么艰苦，去夺取胜利。”五年后，1945年5月9日，当欧洲战场最终宣告胜利时，他又在白厅（Whitehall）的阳台上，向广场上的民众致敬：“愿上帝赐福你们！这是你们的胜利……所有的人，无论男女，都倾尽了全力。所有人都经受住了考验。无论是漫长的岁月，残酷的危险，还是敌人猛烈的攻击，都丝毫没有削弱不列颠民族独立的决心。愿上帝赐福你们！”他承诺的胜利来到了，他立刻将之作为谢礼赠予了人民。然而，胜利应归功于人民，也同样应归功于他——没有他孕育于战争之初，始终贯穿于漫长而跌宕的战事中的“战斗”决心；没有他在“孤军奋战”的十八个月做出的定能找到盟国，夺回对德国军事力量的平衡的判断；没有他对邪恶不可能战胜正义而他的国家体现着美德的信念；没有他不知疲倦的精力和不屈不挠的意志，收获胜利是不可能的。1941年12月他在美国国会讲演时说：“在成长时期，我在父亲办公室受到的教育便是信仰民主。‘相信民众’，便是他对我的教诲。”1940年12月，在他成为保守党领袖时，他也说道：“我一向忠实地服务于两项公